【外国语言学】

英汉小句状语成分分布对比研究

何 伟 伟圣鑫

【摘 要】本文从功能视角对英汉小句状语成分的分布进行对比研究，目的是对英汉状语在句法分布中的差异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人际状语和语篇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分布差异不大，而经验状语和逻辑状语的分布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反映了两种语言不同的语序特点；语序上的不同源于中西方民族不同的认知凸显方式；认知上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民族思维上是重理性还是重悟性的特点；思维上的不同最终归于中西方文化及孕育环境之间的差异。

【关 键 词】英语小句；汉语小句；状语；句法分布；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英汉对比，生态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francesweihe@bfsu.edu.cn；伟圣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修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英汉对比（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2021.2.39～4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建设及汉外对比研究”（项目编号：19ZDA319）的部分成果。

1. 引言

状语成分对比研究是英汉句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英汉状语描写研究。Sidney(1969)、Quirk 等(1985)、初汉平(1987)、Huddleston 和 Pullum(2002)、姜玲(2002)、Carter 和 McCarthy(2006)、双文庭和赵亚星(2017)、王亚南和陈国华(2018)等主要针对英语状语的界定与分类、句法中位、与附语及补语的区分、功能等进行了研究；刘月华(1982)、陆俭明(1983)、庄文中(1984)、朱德熙(1984)、金立鑫(1988)、黄伯荣和廖序东(1991)、陆丙甫(1993)、孙德金(1995；1997)、邢福义(1996)、双文庭(2016)等针对汉语状语的界定与分类、动词与名词性、多项状语的排序及规律等进行了探讨。二是英汉经验意义状语对比研究。金立鑫(1990)、郭中(2013)、王艳伟和蒋庆锁(2013)、双文庭(2016)、潘宁宇(2017)等主要对比了英汉时间状语、地点状语、频度状语、联加状语、工具类状语的句法位置或不同类别状语的排序。对于英汉特定状语句法位置或排序间的不同，郭中(2013)等从类型学视角进行了解读，双文庭(2016)、潘宁宇(2017)等从认知角度进行了阐释。

语言对比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异同所在(尤其是差异)，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就状语而言，如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大多注重特定现象的描写，较少着眼于全局，并且尽管部分研究已经深入到解释层面，但主要是从类型学或认知角度进行的，还鲜有对句法分布的不同给予多层面的阐释。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英汉小句状语分布对比研究，揭示分布上的异同(尤其是差异)，并从语言、认知、思维和文化多个层面对差异进行阐释。

2. 状语的界定和分类

本文首先对状语及其类型进行界定和分类说明。从文献来看，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界的界定与分类不尽相同。有关英语状语，主要存在以下做法。其一，着眼于句法功能和范畴。比如Swan(1981)认为，状语在句子中起修饰作用，由副词和副词短语充当。Alexiadou(1997)认为状语既可由副词充当，也可由其他范畴充当。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这两者的研究突出了状语的修饰功能，但没有详细区分哪个维度的修饰功能。其二，着眼于意义，比如Poutsma(1928)提出“连接状语”的概念，但其研究尚未突破词汇层面。随后，Sidney(1969)、Leech和Svartvik(1975)、Quirk等(1985)、Carter和McCarthy(2006)等对状语进行了几种至二十多种的分类描述和探讨。比如，Carter和McCarthy(2006)认为，状语以某种方式修饰、评论或扩展小句的含义，如时间、方式、地点、频率、原因、强度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涵盖经验意义状语，对于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状语虽有涉及，但不全面。其三，着眼于语言三大功能。Halliday(1994)将英语小句中的状语系统地分为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三类。同样，受到Halliday的影响，Biber等(1999)也从功能角度对英语状语进行了分类，将其划分为环境、立场和连接状语。尽管Halliday(1994)从功能角度将形式与意义结合起来对状语进行了界定和分类，但由于没有严格遵守相关标准，“内部成员依旧在功能上缺乏同质性”(王亚南　陈国华，2018：57)。

对于汉语状语的界定，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观点。最早是从修饰语本身出发的。马建忠在《马氏文通》(1898：21)中指出：“凡实字以貌动静之容者，曰状字”。其对“状语”的认识受到了印欧语的影响。此后，学界对状语的界定聚焦中心语的性质特点，比如黎锦熙(1924)、吕叔湘(1942)、王力(1943)、丁声树等(1961)认为，所谓状语，实际上就是能够添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的句子成分。朱德熙(1985：47)认为，“凡是真谓词性偏正结构里头的修饰语都是状语。”目前来看，学界基本认可并采纳了朱德熙的标准(李杰，2009：39)。

对汉语状语的划分，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其一，着眼于词类本身以及中心语的性质。比如丁声树等(1961)将“状语”分为“动词性修饰语”和“形容词性修饰语”，并将前者分为六个不同的小类。吕叔湘(1979)认为状语可以划分为修饰状语、关联状语和评注状语。朱德熙(1984)根据修饰语性质及整个偏正结构的情况，认为体词性中心语前面的成分是定语，而谓词性中心语前面的成分是状语，并指出状语由副词充当。其二，着眼于充当状语的词的词性。比如，朱德熙(1984)将状语分为副词性状语和形容词性状语。其三，着眼于句法结构。比如张志公(1982)将状语分为副词、形容词、偏正词组、主谓词组、述宾词组等多种形式。其四，着眼于功能和意义。黄伯荣和廖序东(1991)首先将状语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状语。前者主要表达时间、处所、否定、方式、手段、目的、范围等；后者主要描写动作状态，部分描写性状语描写动作者的情态。如上所述，在汉语状语的界定和分类上，不少研究没有将形式和意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分类主要涉及表达经验意义的状语，对于表达其他意义的状语的描述似不够系统和全面。

系统功能语言学坚持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来描写语言，即“以意义为中心，形式体现意义”。Fawcett(2008)、何伟等(2015a；2015b)指出，状语与主语、谓体及补语(大致对应于其他学界的谓语和宾语)不同，它尽管不是小句的一个必需成分，具体来讲，是一个可选的、数量不定的成分，但却为小句意义的完整提供必要的信息。Fawcett(2008)对英语状语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何伟等(2015b；2015a)对英汉状语进行了类别描述，将两种语言中的状语整体上分为表达经验意义、逻辑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的四类，这四大类状语又进一步区分为数十个小类。

本文认为，相较于其他分类，Fawcett(2008)、何伟等(2015a；2015b)从语言的经验、逻辑、人际和语篇元功能出发，对于状语的分类较为全面、系统，涵盖所有意义类型的状语，不存在明显的重复和交叉。因此，下文基于这种分类对英汉状语句法分布进行对比研究，并探讨差异的成因。

3. 英汉小句状语分布情况

为揭示英汉状语句法分布特点，本文选取真实的语料，即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建设的功能句法数据库中随机抽取含有状语的英汉语小句各1000个，进行状语句法位置的统计，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1 英汉小句状语分布比例

状语类型 \ 位置	英语状语	汉语状语
句首	37.43%	37.09%
句中	20.32%	54.03%
句尾	42.25%	8.87%

从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英汉小句中，状语的典型位置存在一定的差异。英语小句中，状语主要分布在句尾和句首，较少出现在句中，即较少出现在小句的主语和主要动词(相当于汉语小句中的谓体)之间。与英语小句不同，汉语小句中，状语主要分布在小句句中和句首，较少出现在句尾。

同时，根据Fawcett(2008)和何伟等(2015a；2015b)对状语的分类，本文接着对不同类型的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出现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类型的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出现比例

状语类型	经验状语	逻辑状语	人际状语	语篇状语
英语小句分布比例	65.21%	20.08%	3.05%	11.06%
汉语小句分布比例	66.37%	16.81%	4.87%	7.08%

从表2可以看出，英汉小句中，经验状语出现的比例明显较高，逻辑状语较语篇状语稍高，语篇状语较人际状语稍高。为进一步研究英汉小句中状语分布的差异，我们继续统计了不同类型的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类型的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分布情况

	经验状语		逻辑状语		人际状语		语篇状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英语	汉语
句首	30.97%	23.33%	26.66%	55.67%	77.27%	44.44%	71.33%	69.57%
句中	10.18%	73.33%	10.00%	43.33%	22.73%	55.56%	26.66%	30.43%
句尾	58.85%	3.33%	63.33%	0.00%	0.00%	0.00%	2.01%	0.00%

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小句中，经验状语主要出现在句尾和句首，仅少量出现在句中。而汉语小句中，经验状语主要出现在句中和句首，很少出现在句尾。同样，逻辑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分布也有所不同。英语小句中的逻辑状语主要分布在句尾和句首，而汉语小句中的逻辑状语主要分布在句首和句中，句尾鲜有发现。人际和语篇状语在英汉小句中的分布差别较前两类均不明显，主要出现在句首和句中。

本文统计上的发现，与学界相关学者的观点一致。比如，潘宁宇(2017)探讨了工具型状语，发现英语主要是“with+NP”结构，汉语主要是“用+NP”结构，两者在结构上没有区别；然而，“with+NP”一般位于句尾，而“用+NP”紧邻并位于谓语动词之前。潘宁宇(2017)并从认知语言学的“凸显观”和“注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英汉工具状语在小句中的典型句法位置。

鉴于经验和逻辑状语分布差别较大，下文着重探讨这两类状语分布不同的原因。

4. 英汉状语典型分布原因

英汉状语句法分布上的差异与语言类型存在一定的关系，而在语言类型的背后，是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的不同。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4.1 英汉语言因素

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看,英语属于典型的SVO型语言。VO语言是中心词居首的语言,“中心词+修饰语”是优势语序(丁志斌,2018:13)。

有关小句的语序,Bybee(1985)认为,语义接近的成分在线性序列中的位置也比较靠近。陆丙甫(1993)将这种现象称为“语义靠近原则”,他认为语义上宾语比主语跟动词的关系更密切,那么在结构上,宾语也应该比主语更靠近动词。在VO语序中,V是小句的谓语,而O作为宾语应与V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不被其他成分隔开。Lambrecht(1994:79)认为,句子语序的排列与“定指性”与“指称性”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也就是陆丙甫(2005)就语序而描述的“可别度领先原则”,即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可别度高的成分前置于低的成分,旧信息高于新信息的可别度。英语小句中,主语和宾语一般都由名词充当,但主语一般是小句的旧信息,而宾语是小句的新信息,因此,成分S应位于成分O的前面。基于语义靠近原则和可别度领先原则,英语中,V和O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位于O之前,S的可别度高于V,因此其语序为SVO。在生成语法研究中,Hawkins(1995:57)提出了“直接成分尽早识别原则”(Early Immediate Constituents)。英语小句中,主语、谓语、宾语都属于直接成分,因此理应在句中优先出现,而状语不属于直接成分,因此在句中不会优先出现。综上所述,英语小句中,尽管成分S和V之间不如V和O之间的语义紧密度高,但是状语一般也不能位于S和V之间,而主要位于句尾和句首。

从语序角度,汉语虽然也属于SVO型语言,但并不典型,汉语也呈现SOV型语言的特点(Koopman,1984;Travis,1984)。Greenberg(1963)认为,不同于SVO型语言,SOV语言的语序是“修饰语—被修饰语”。一般来讲,动词是小句的核心,属于“被修饰语”。由此,SOV型语言是句尾核心型语言,即小句最重要的部分处于句尾,而状语作为非核心成分,一般不能置于句尾,只能移位到句首和句中。此外,由于受到“语义靠近”原则的影响,O、V两个成分的语义紧密度较高,不能拆开,因此即使将状语置于句中,一般也不能置于O、V之间,主要是主语后面或句首。鉴于汉语是SVO型和SOV型特点兼存的语言,其状语分布也就应与英语有较大的不同。

4.2 英汉认知因素

英汉语隶属不同的语言类型,这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在认知方式上的不同。Ungerer和Schmid(1996/2001)提出了凸显观认知方式,指“主体或图形”与“背景”之间的选择倾向。丁志斌(2018)指出,英民族具有很强的由“图形”到“背景”的感知倾向,反映在语言上,则是在中心词与修饰语的关系中,中心语为图形,修饰语为背景,即先提中心语,后提修饰语;汉语则相反。该观点可为英汉状语的典型分布提供认知上的解释。例如:

(1)I have played a lot of games before.(*All Dogs Have Their Days*)[①]

(2)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济南的冬天》)

例子中的划线部分“before”和“在冬天”均为状语,英语小句遵循的是由图形到背景的认知顺序,即由较强的到较弱的认知凸显成分;汉语小句则是由背景到图形的顺序,即由较弱的到较强的认知凸显成分,也就是按照发生先后顺序对小句成分进行排列。比如对于例(2),我们可作以下解释:首先,“季节要到冬天”;然后,“人们在面上含笑”。

英汉小句中逻辑状语的分布也同样体现了中西方认知模式的不同。例如:

(3)I think he hardly knew what he was saying, for when I asked him what business he was.(*Great Gatsby*)

(4)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平凡的世界》第一版)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例(3)中,“for”引导的成分是状语,由于西方民族主要是按认知凸显顺序排列小句成分,因此逻辑状语也通常位于句尾;汉语的认知顺序是时间或事理上的先后,即先有因后有果,因此例(4)中,“由于”引导的状语出现在句首。需要指出,有时因强调,英汉小句中状语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动。

4.3 英汉思维因素

民族之间认知方式上的不同反映了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连淑能(2002:40)指出,思维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虽含有理性主义因素,但较注重直觉、体验、领悟,因此本质上是悟性主义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连淑能,2006:35)

(1)重本质与重直觉

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开启了西方探寻“先验本质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传统”(王寅,2014:25)。西方民族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形成了重本质的思维方式。反映在语序中,就是先把“本质的事物”说清楚,然后再增补“非核心”成分,从而形成“抽象逻辑”理性思维的表述方式。英语小句中,由于状语属于“非核心”成分,一般出现在句尾,但有时因强调或语篇发展的需要,也会出现在句首,但一般不出现在句中。例如:

(5)It was raining heavily.(*A Wet Night*)

(6)I laughed quietly.(*All Dogs Have Their Days*)

以例(5)来说明,“rain”是主要动词,副词“heavily”是状语,其功能是描述“雨下”的程度,属于经验状语中的程度状语。由于状语不是小句的核心成分,因此,这个小句中表示程度的状语“heavily”出现在句尾。

汉民族的思维是一种悟性思维。悟性思维的特点之一是重直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对汉民族悟性思维阐述的是“《易经》的八卦说和《尚书·洪篇》的五行说”(邱述德,2013:83)。这两篇文献都认为汉民族的悟性思维主要是借助自身的直觉和意象来认识世间万物。后来,北宋的程颐、程颢提出的“格物致知”以及朱熹提到的“格物穷理”,以及“置心物中”便可“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都强调了通过自身的直觉来完成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连淑能,2006:35)。汉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汉语小句成分的排列中,就是经验状语总是出现在谓体前,比如下面例句中的状语,总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7)她的头有些无力地贴着老头的肩膀。(《静默地守候》)

(8)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挪动着。(《静默地守候》)

以小句(7)为例,“贴”是谓体,“无力”是状语,属于经验意义状语中的一种,用来修饰谓体“贴”,表达方式意义。“无力地贴着老头的肩膀”这样的语序给读者一种典型的直觉体验。这说明汉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从直觉体验入手,即“直觉”优先。因此,汉语的经验状语一般位于谓体之前,把谓体所表征动作等的方式、状态等凸显出来。

(2)重分析与重整体

西方民族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理性意味着主客体二分,需要强调主体时强调主体,需要强调客体时强调客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笛卡儿“明确地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哲学家,使之成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连淑能,2002:43)这种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逻辑思维,体现在英语小句中,总是最重要的主体成分先呈现出来,然后再呈现次重要的客体成分。因此,在英语小句中,状语一般位于句尾,很少出现在句中。例如:

(9)The flight attendants were frozen in their seats.(*After a New Crash*)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10)The anxiety surrounding Nigerian air travel continued on Friday night.(*After a Crash, New Anxiety for Travelers in Nigeria*)

例(9)至(10)中的划线部分均为状语,分别表达方位意义和时间意义。经验状语的这种位置基本遵循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小句的前半部分是小句的主体成分,后半部分是作为客体成分的状语。

逻辑状语的分布也是如此(何伟刘佳欢,2019)。例如:

(11)This can only happen if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 and groups share a number of core values.(*A Harmonious Society*)

(12)It is not always easy, because opinions can differ.(*A Harmonious Society*)

"天人合一"理念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该思想注重整体性,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和认识事物,不突出主客体的区分。"天人合一"思想对汉语的影响可见证于状语的位置。例如:

(13)他一跛一跛地走着,全身发着抖。(《远大前程》)

(14)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未来能源》)

例句中的"一跛一跛"和"到2050年"是经验状语,即本文提及的客体成分。它们出现在主语与谓体两个主体成分之间,也就是说汉语小句没有明确地区分主客体成分,而是将主客体置于一起,可以看出,汉语小句的状语位置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

(3)重逻辑与重具象

西方民族自古希腊时期起,一直受到理性思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认识世界时凸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形成了探索事物之本的直线型思维,即以"逻辑在先"的思维范式(李成旺,2017)。在用语言进行思维表达时并不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临摹",而是按照逻辑上的重要性进行小句成分排列,即先表达逻辑上最重要的事物。一般是主语、谓体、补语先出现,之后才是状语,尤其是经验状语和逻辑状语。例如:

(15)...a stream had formed in the field.(*A Wet Night*)

(16)It is not always easy, because opinions can differ.(*A Harmonious Society*)(为方便,此处重述上文的一个例子)

通过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西方民族的逻辑思维方式可以体现在经验和逻辑状语的语序上。比如在例(15)中,"in the field"是状语,表达地点意义。小句先表达最重要的事件意义,即"a stream had formed",然后再添补的这个状语。同样,在(16)中,"because opinions can differ"是小句的状语,表原因,而在小句的成分排列上,先表达结果意义,然后再补充原因。然而,从事件发生时间顺序上看,后面的原因事件应当是先于结果而发生。

在表达事件意义时,汉民族和西方民族有所不同。汉民族不是按照事件的逻辑重要性,而是按照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来表达。戴浩一(1988)提出,时间顺序原则(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是汉语语序遵循的一个原则。我们认为,汉民族遵循的时间顺序原则可归于汉民族悟性思维的具象性特点,主要是汉民族对时间认识上的具象把握。《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明世间万物从无到有的过程,体现自然事物的衍生顺序,反映汉民族尊重自然顺序的思维模式。到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凌曙,1975:457-464)中说道:"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对五行顺序的表述也是一种尊重自然顺序的思维模式。同时,我们认为,儒家强调"礼"的文化也同样体现了汉民族的时间哲学。儒家文化倡导"纲常礼教",尤其是老幼尊卑有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老少少等。这种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的排位实际上反映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是中国古人对自然时间的排位。也就是说,儒家所倡导的“礼”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人对春夏秋冬、子丑寅卯有着明显的时间更迭的借鉴与临摹,是中国古人对由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线性时间现象的认识。这在语言中的体现,可见证于汉语小句中经验和逻辑状语的典型位置。例如:

(17)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大自然的语言》)

(18)由于各拱相连,所以这种石桥叫做连拱石桥。(《中国石拱桥》)

例(17)中,“立春过后”是表达时间意义的经验状语,该小句的排列顺序表明,“立春”这个事件先发生,也就是说先要到“立春”时节,然后大地才“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同样,在例(18)中,首先是原因发生,即首先是由于“各拱相连”,然后才因此得名“连拱石桥”。

4.4 英汉文化因素

中西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可在文化中找到解释。从历史角度看,西方文化体系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近现代则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而东方文化体系以中国为代表。古希腊特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即产生了主客二分、本质追问的思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2006:224)一书中提到:“我们在这个地方碰见的是山岭、狭窄的平原,小小的山谷和河流;这里并没有大江巨川,没有开阔的‘平原流域’;这里山岭纵横,河流交错,结果没有一个伟大的整块。”古代希腊崎岖的陆地环境阻碍了古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希腊三面环水,这种良好的海洋环境又给希腊人勇于冒险、寻求向外扩张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在政治文明历程方面,公元前8世纪希腊半岛的许多国家各城邦独立为政,城邦与城邦之间互不干涉(曹大为赵世瑜,2004)。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于东方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农耕文化始于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具有听天由命、隐忍含蓄、封闭自守的特点。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未能使中国古代像古希腊那样萌发出世界本质追问。中国古代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是朴素的,人们往往从主观出发认识客观世界,把世界看成一个模糊的整体,因而产生了整体性认识、“天人合一”理念。这种整体性认识和“天人合一”理念贯穿于西周初年成形的《易经》(高亨,1979)。《易经》将八卦看作表示自身阴阳变化的阴阳系统,认为八卦可以通过相互叠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表明世间万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乾·文言》(郭彧译注,2006:350)提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其中,“先天”主要指自然界,“后天”主要是说人要遵从自然规律,与大自然相适应。《易经》引领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王周谊 张祥平,2010)。此外,《庄子·齐物论》说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引自《庄子》,方勇译注,2010:31)。如上所述,“天人合一”理念自产生后,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结语

基于功能句法理论,本文对英汉小句状语分布特点及差异原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英汉小句中,人际和语篇状语的分布差别不大,而经验和逻辑状语的分布差别较大。经验和逻辑状语分布差异较大的原因是,两种语言的语序特点不同;语序上的不同归于中西方民族认知方式上的不同;认知上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思维上的不同最终归于中西方文化及孕育环境之间的差异。换言之,西方民族受源于海洋文化的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重本质、重分析和重逻辑的理性思维,从而造就了由图形到背景等的认知方式,也就最终带来了语言结构先主要核心成分,后次要非核心成分的顺序;与之相反,汉民族主要受农耕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重直接、重整体和重具象的悟性思维,从而造就了由背景到图形等的认知方式,也就最终带来了语言结构中次要非核心成分并非出现在最后的特点。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注释：

①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有例子均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建立的功能句法数据库，例子后面均附了原始出处即具体篇章的名称。

参考文献：

[1]Alexiadou, A. 1997. Adverb Placement—A Case Study in Antisymmetric Syntax[M]. Amsterdam: Benjamins.

[2]Biber, D, S. Johnson, G. Leech, S. Conrad & E. Finegan. 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 London: Pearson.

[3]Bybee, J. 1985. Diagrammatic iconicity in stem-inflection relations[J]. In J. Haiman(ed.). Iconicity in Syntax[C]. Amsterdam: Benjamins.

[4]Carter, R. & M. McCarthy 2006. Cambridge Grammar of English[M]. Cambridge: CUP.

[5]Fawcett, R. 2008. Invita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rough the Cardiff Grammar: An Extens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quinox.

[6]Greenberg, J.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A]. In J.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C]. Cambridge: MIT Press.

[7]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 Edition)[M]. London: Arnold.

[8]Hawkins, J. 1995.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Order and Constituency Cambridge[M]. Cambridge: CUP.

[9]Huddleston, R. & G. Pullum. 2002.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Cambridge: CUP.

[10]Koopman, H. 1984. The Syntax of Verbs: From Verb Movement Rules in the Kru Language to Universal Grammar[M]. Dordrecht: Foris.

[11]Lambrecht, K.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M]. Cambridge: CUP.

[12]Leech, G. & J. Svartvik. 1975.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3]Poutsma, H. 1928. A Grammar of Late Modern English, Part One[M]. Groningen: P. Noordhoff.

[14]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15]Sidney, G. 1969. Studies in English Adverbial Usage[M]. London: Longman.

[16]Swan, M. 198 1. Practical English Usage[M]. Oxford: OUP.

[17]Travis, L.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n Word Order Variation[D]. Boston: MIT.

[18]Ungerer, F. & H. Schmid. 1996/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Longman/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曹大为　赵世瑜.2004.政治文明历程[M].长沙：岳麓书社.

[20]初汉平.1987.英语状语的中间位置[J].山东外语教学，(2)：29-33.

[21]戴浩一.1988.黄河译.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J].国外语言学，(1)：10-20.

[23]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

[24]丁志斌.2018.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类型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10-14.

[25]方勇译注.2010.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

[26]高亨.1979.周易杂论[M].济南：齐鲁书社.

[27]郭彧译注.2006.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

[28]郭中.2013.OV/VO语序与状语位置关系的类型学考察[J].民族语文，(1)：46-57.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9]何伟 高生文 张娇 贾培培 邱靖娜.2015a.汉语功能句法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0]何伟 刘佳欢.2019.英汉语小句间逻辑语义关系及表征方式对比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17.

[31]何伟 张敬源 贾培培 张娇.2015b.英语功能句法分析[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2]黑格尔.2006.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33]黄伯荣 廖序东.1991.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4]金立鑫.1988.成分的定位和状语的顺序[J].汉语学习,(1):11-15.

[35]金立鑫.1990.英汉时地状语语序的一致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2):148-153.

[36]姜玲.2002.英语联加状语的语篇功能[J].外语与外语教学,(1):19-22.

[37]李成旺.2017.西方"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生成历程与基本特点[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52-59.

[38]李杰.2009.汉语状语的界定和范围[J].汉语学习,(2):38-43.

[39]黎锦熙.1924.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40]连淑能.2002.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40-46+63-64.

[41]连淑能.2006.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7):35-38.

[42]凌曙(注)董仲舒.1975.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

[43]刘月华.1982.状语与补语的比较[J].语言教学与研究,(1):22-37.

[44]陆丙甫.1993.关于建立深一层的汉语句型系统的刍议[J].语言研究,(1):7-20.

[45]陆丙甫.2005.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J].当代语言学,(1):1-15+93.

[46]陆俭明.1983.关于定语和状语的区分[J].汉语学习,(2):12-28.

[47]吕叔湘.1942.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

[48]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49]马建忠.1898.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

[50]潘宁宇.2017.英汉工具状语典型句法位置的认知对比研究[J].现代外语,(5):619-629.

[51]邱述德.2013.汉英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本体途径[J].中国外语,(2):83-89+93.

[52]双文庭.2016.英汉多项状语并置语序差异的认知阐释——以工具、地点、频度和时间状语为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5):24-27,80-81.

[53]双文庭 赵亚星.2017.英语时限状语及时段状语视角下的事件终结性解读[J].外语学刊,(4):40-44.

[54]孙德金.1995.现代汉语名词做状语的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4):88-98.

[55]孙德金.1997.现代汉语动词做状语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4):116-129.

[56]王力.1943.中国现代语法[M].商务印书馆.

[57]王亚南 陈国华.2018.英语状语、附语和补语的界定[J].外国语文,(4):57-66.

[58]王艳伟 蒋庆锁.2013.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汉对比关系联加状语对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31-36.

[59]王寅.2014.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0]王周谊 张祥平.2010.从《易经》语言看中华先民的思维特征[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6):100-102.

[61]邢福义.1996.汉语语法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62]张志公.1982.现代汉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63]朱德熙.1984.定语和状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64]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

[65]庄文中.1984.多项定语和多项状语[J].语文教学通讯,(9):44-4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